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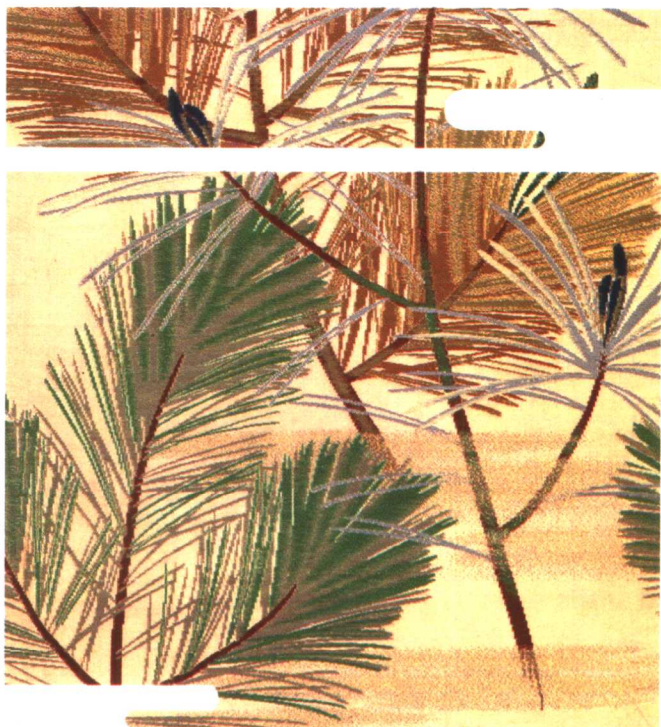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编

21 世纪 与中国文化

〔日〕加藤周一◎著

彭佳红◎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編

21世纪与中国文化

〔日〕加藤周一 著
彭佳红 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与中国文化/(日)加藤周一著;彭佳红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978-7-101-05715-7

I.2… II.①加…②彭… III.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I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9994 号

书 名	21 世纪与中国文化
著 者	〔日〕加藤周一
译 者	彭佳红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8}$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715-7
定 价	25.00 元



加藤周一，日本著名评论家、作家。1919年9月19日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医学博士。1949年以《1946，文学的考察》初登文坛。50年代留学法国，在研究医学的同时接触欧洲文化。1958年开始作为一名专业作家写作。1980年代表作《日本文学史序说》获大佛次郎奖。曾在加拿大、德国、瑞士、

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中国等各国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加藤周一著作集》全24册、《羊之歌》等。现在，仍在《朝日新闻》连载《夕阳妄语》。

译者：

彭佳红，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教授。1955年11月7日生于上海，1981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文学。专攻日中比较文学（包含儿童文学）。东亚比较文学会议日本支部理事。主要译作有《蛇王子》（少年儿童出版社），《猫大王的冒险》（日本偕成社）等。并有研究中日两国诗人作家雁翼、庄野英二、井伏鱒二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 |
|--|-------------------------|
| 桑原鹭藏 | 《东洋史说苑》 |
| 青木正儿 | 《中华名物考》(外一种) |
| 小川环树 | 《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
| 兴膳宏 |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
| 佐竹靖彦 | 《梁山泊——〈水浒传〉108名豪杰》 |
| 入谷仙介 | 《王维研究》(节译本) |
| 西原大辅 |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东方幻想》 |
| 广田律子 | 《“鬼”之来路——中国的假面与祭仪》 |
| 南方熊袖 | 《纵谈十二生肖》 |
| 中西进 |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 |
| 池田温 | 《敦煌文书的世界》 |
|  加藤周一 | 《21世纪与中国文化》 |
| 静永健 | 《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 |
| 笈文生 笈久美子 | 《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 |

责任编辑 马燕

封面设计 毛淳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



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



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致中国读者

加藤周一

自1971年秋天初次访问中国直至今日,有各种机会使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文章。现在将这些文章译成中文,编成此书。怎么说我也不是一个中国专家,可为什么我会对中国如此关心呢?在此我想列举以下几个理由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理由,犹如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事件一样,出于偶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中岛健藏的邀请是我最初访华的契机。那时日本和中国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个人想去中国旅行是非常困难的。中岛为首的约十人左右的访华团,我忝居末席初次访问了中国。“百闻不如一见”,这“一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利用种种机会和方法多次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日中恢复了邦交、我的《日本文学史序说》等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去集中讲演在北京度过了几个月。

几个月作为居住不算长,可作为旅行却不算短。在这期间给了我一些接触一般中国市民日常生活的机会,这是几个星期的旅行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偶然,也是我本身的强烈愿望。北京大学的热忱好意使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了。

我尽其薄力想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其理由之二,是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有关日本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每当我寻求日本



文化的历史性源泉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归根结蒂都与中国的古典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稻田耕作、大型木结构的建筑、丝绸纺织技术、文字和文字记录的习惯,纸、墨、笔的文化等,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这样的传播不局限于日本。中国和汉民族的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以东亚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提供了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学问体系。日本文化是其周边文化之一。文化是由中心向周边传播的,而不是相反。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关系可以简称为中心一周边的关系。

只是这里所说的中央对周边的关系不一定是指军事上的强弱关系,也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支配关系,而是意味着文化上的关系。概念、价值的普遍性,中央文化的地区特殊性是周边文化的特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作为各自的文化整体之优劣或先进落后。可是它决定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向。

征服了中国的北半部或全土的周边民族(女真、蒙古人、满洲人等),与其说是用他们的文化来强制汉人,毋宁说他们自身被汉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支配了。也可以说,依仗武器的征服者成了文化的被征服者。这和古罗马对古希腊的军事镇压很相似,其文化性结果,招致了罗马的希腊化,而不是希腊的罗马化。就如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曾是希腊一样,东亚的文化中心曾是中国。幸运的是日中之间没有长期的军事占领的历史,文化水准的差距决定了日中关系。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的人很自然地会意识到作为日本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的存在。反过来说,中国学者也能从日本文化这面镜子中找到本国文化的身影吧。

第三,可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西方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当模特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从日清战争(译者



注：指中日甲午战争）到出兵山东；从“二十一条”到“满洲国”，进而从1937年起大批军队把战线扩展到中国全土。这次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到日本向联合国投降的1945年夏天。在这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据中国方面报道，估计有二千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样大规模的破坏，从国际法来看是犯罪，从伦理上看是难以容忍的。尽管如此，战后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民持宽大的态度。可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宽大是否也自觉、充分地反省过去的犯罪行为，明确地与过去的军国主义日本作诀别了呢？事实上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这就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大不相同之处。其结果是德国在构筑和近邻诸国的信赖关系上取得了成功，而日本却至今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深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访华团成员时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对诸位贵宾不要求意见的一致，只要这意见不是反中国的，对所有的日本人我们都欢迎。”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努力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工作，虽然这努力也许微不足道，但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不违背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

第四，我认为日中友好关系是21世纪维持东亚的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信赖关系不可再耽误时机了，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了。何时开始都行，即使是很小的贡献也好，必须为此尽自己的一切可能作贡献。

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想、意见中也许有不少错误。尽管如此，假如仍有让中国读者一读的价值的話，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2004年9月于东京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加藤周一 1
-------------	--------

我和中国

寄语《中岛健藏展》	3
初次访问南京	5
中国的飞檐	8
敦煌有感	16
中国电影三题	21
北京的春天	24
北京的秋天	28
再访北京的秋天	32

历史和文化

战争和战后——日中关系的问题	39
从“南京”追溯到“旅顺”	51
香港有感	55
香港旅情	59
春秋无义战	63
儒教再考	67



三星堆的青铜器	71
中日文化的两极互反性	74
佛像群的发现	89
中国的水墨画和日本的水墨画	93

文学和翻译

什么是文学或有关《中国文学史》	107
“天丧予”或有关《论语》	110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112
宋学的日本化	122
诗人们	130
明治初期的翻译——为何而译？译什么？怎样译？	142
文学的使命——在科学技术文明的时代	184
近代的翻译诗——翻译的叛逆之说	206
渊明和一休	217
提倡翻译	221
《圣经》和《论语》的意义	224
偷羊人的话题	228
趋庭日	231
翻译、风流、自然	234

21 世纪和中国文化

新世纪的希望或有关“历史意识”	241
20 世纪曾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243
围绕中国的国际问题和日本——与罗贝尔·吉朗的对话	265



多种语言的必要性	282
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和未来——与一海知义的对话	286
对“汉字文化圈”构思的补充	300
 东瀛风流人物——加藤周一(代后记)	 312